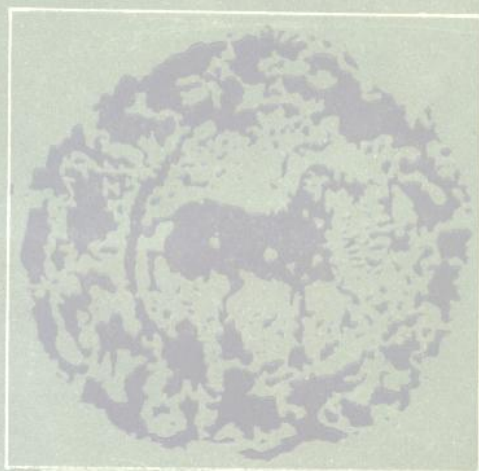


西域
史地文物丛考



文物出版社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

马雍著

文物出版社

1193866

责任编辑：张庆玲

封面设计：周小玮

1056/56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

马雍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开 印张：16.25 插页：9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048-4/k·17 定价：15.20元



作者像

序

马雍同志选择他近年来研究西北边疆历史地理以及古迹文物等问题的论文十八篇，编成《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将由文物出版社印行，嘱我写序。我和他相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十五年来亲见其由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学术界达才通人的过程，故虽不善为文却乐为此序。

马雍同志是湖南衡阳人，他的父亲马宗霍教授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深通经术，尤精“小学”，所著《中国经学史》、《音韵学通论》、《说文解字引经考》等书，书坊一再重印，在学术界声誉日隆，流传很广。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再罹浩劫，衡阳倍遭炮火，学校迁在蓝田，僻处丘陵地带，生活十分艰苦，却仍然潜心研讨故训，从容教诲后学，以期振兴民族文化。

马雍同志资质聪颖，生长在颠沛流离之中而不废读书，秉承家学，精熟五经四史。解放后，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当研究生，专攻西欧历史。因此，他学通中西，知识渊博。1954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先是致力于翻译，已出版的译作（部分与他人合译）有塔西佗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摩尔根著《古代社会》和罗斯托夫采夫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后者征引浩博，翻译颇费心力。其后，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并作西北史地和中外关系之探讨。

三十多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土的历史文物极多。国家文物局常请马雍同志鉴定或考证这些新资料，吐鲁番所出古高昌国文物尤能触其所好，遂有“献身高昌”之言。

1979年历史研究所建立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马雍同志任副主任，1982年改任主任。该室初创，马雍同志周密筹划，奋力开拓研究项目，延揽专家，培养青年学者并指导研究生，充实力量以奠定基础，使这一研究机构初具规模。1981年5月，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厦门成立，马雍同志当选为秘书长。

中亚细亚一带，地处亚洲枢纽，几千年来民族移徙、国度废兴，其语言文字宗教服饰资料既多，研究者亦众；我国各族学者知识积累，基础尤为深厚，但向无组织、缺乏信息，作品不易发表，知识不能交流。马雍同志既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遂以忘我的

精神致力于繁荣国内学术事业和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79年，他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起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邀请兄弟民族专家学者参加。协会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他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担负起主编《中亚学刊》的任务，并制定了编写《中亚古代史》的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编写《中亚文明史》，邀请中国参加，马雍同志出席，任编委，主编第三卷；为此他几度到巴黎开会，加入国际中亚学会，并当选为理事。

马雍同志治学不以坐览大量资料为满足，虽然肩负繁重的工作，而且体弱多病，却坚持多次到西北作实地考察，曾赋诗：

一年一度出阳关，嚼雪眠沙只等闲。

旧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许天山。

可见他为学术献身的坚毅精神。这部论文集不只记载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反映出他是以怎样敏锐的见解、精细的工夫考查史料的。

马雍同志博闻强记，融会我国古代经史写成的史学论文，以及考证各地出土文物的文章还有许多，后者之精粹，别为一卷附于书后，其中也有不少发明与创见。

近代湖南学者，并世公认魏源（1794—1857年）为第一，其所作《诗古微》、《书古微》、《老子本义》等，追求古义而皆有新意。魏源生当中国封建社会没落、资本主义入侵之际，深感民族文化的危机，有迫切研究四周兄弟民族和远洋诸国的愿望，所作《元史新编》、《圣武记》以及参加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都是经世致用之书，而《海国图志》一百卷是汉文第一部世界地理志，为国人了解外国史地开创先路。魏源是邵阳人，与衡阳邻接。马雍同志由经史之学转而为中外关系及中亚文化的研究，以及经世致用之志，与魏源相同，或受乡贤影响。魏源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论观点，可惜生活在百多年前，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思想虽有许多可贵的因素而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樊篱。马雍同志长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受党的正确领导，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研究指导，成绩自又不可同日而语矣。

张政娘

1985年10月26日

目次

序.....	张政烺 (1)
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1)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	(11)
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	(16)
《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	(24)
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	(41)
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	(46)
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	(60)
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兼论楼兰遗址和魏晋时期的鄯善郡.....	(89)
新疆佉卢文书中之 Kośava 即𑖦𑖅𑖹𑖅考——兼论“渠搜”古地名.....	(112)
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时期文书概述	(116)
吐鲁番的“白雀元年衣物券”	(122)
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	(129)

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银盘	(138)
突厥与高昌麹氏王朝始建交考	(146)
麹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	(154)
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	(163)
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	(174)
评黄文弼著《西北史地论丛》	(183)

附 卷

轱侯和长沙国丞相——谈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主人身份 和墓葬年代的有关问题	(186)
论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	(198)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章的年代和历史背景	(209)
再论《战国纵横家书》第四章及其有关的年代问题——答曾鸣同志	(227)
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	(233)
编后记	余太山 (250)

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早在两汉以前的远古时代，我国新疆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即已同我国其他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新疆普遍发现的细石器文化同甘肃、内蒙、东北各地广泛存在的细石器文化基本一致。昆仑山北麓所产的玉石从古代即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阿尔泰地区公元前5世纪的墓中已经发现从内地输去的绣花丝织品和青铜镜。在先秦的许多文献中都提到了新疆地区的山川、部落和物产。

公元前2世纪上半期，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匈奴人所建立的王朝，将西域的游牧部落和半农业半游牧土邦都置于其控制之下。其后不久，西汉王朝因受到匈奴不断的侵扰和压迫，遂联合西域各地区人民共同反击匈奴。从汉武帝派张骞首次到西域时起，经过了七十多年同匈奴的斗争，最后获得胜利。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始置西域都护，作为代表中央政府统辖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治乌垒城（在今轮台县境），其管辖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地区。

到东汉初，天山南北的许多地区，曾被北匈奴单于手下的呼衍王所控制。东汉中央政府同北匈奴进行了反复斗争，终于重新统一西域。东汉也曾设过西域都护，后废除，于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复置西域副校尉，驻敦煌。至延光二年（123年），置西域长史，驻柳中（在今鄯善县境）。其后，西域长史移驻于阗，直到东汉末年。

两汉中央政府在西域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和军事组织，发展了西域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加强了西域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并通过西域扩大了中国同西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和交往，这一切对于新疆地区的历史，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新疆地区保存了大量的两汉时代的历史文物，其内容包括各种遗址、墓葬以及出土的汉文木简、印章、钱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工艺品等。结合文献记载，研究这些历史文物，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两汉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政治、经济措施。

两汉时期在西域各地的地方行政组织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国”的名称，在原来的部落或土邦的基础上，任命原有国王为王，比之于内地的诸侯王。在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置不同名称和不同员额的官职。关于这方面，《汉书·西域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中有些官职保留了当地原有的名称，如大禄、且渠之类；有些官职则显然为汉朝中央政府所增置，如都尉之官，几乎各地都有。东汉时期，又见到有主簿等职。

《汉书·西域传》云：“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以乌孙为例，其大吏、大禄、大监等皆佩金印紫绶。这五十国均在西域都护“督录总领”之下。东汉继承西汉的制度，但往往更加授某些官号，如光武帝赐莎车王贤以汉大将军印



图一 “汉归义羌长”印

绶，顺帝时拜疏勒王臣磐为汉大都尉，即是其例。桓帝时，曾收回中央政府所赐车师后部王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可以证明西汉时由中央政府颁赐西域君长和属官以印绶的制度，维持至东汉末年未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于什格提汉代遗址内曾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印，篆文，铜质，卧羊钮(图一)。两汉时代，西域地区有羌族居住，此印当系汉中央政府颁给羌族首领者。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还曾先后发现两颗文字相同的

铜印，龟钮，篆刻，阴文，印文为“常□之印”。□字残破，旧释为“公”，不确。从字体和形制看，这三颗印章都是私印，属同一人，其名字不见于史籍，当是在西域任将吏者。

汉朝政府还授予西域各君长以节传。节是奉皇帝命令以传达号令赏罚的标志，以竹杖为之，长八尺，上悬挂牛尾，亦称节传。节传是重要官吏行使职权的凭证。汉亡以后一百多年，至前秦苻坚时，将军吕光出兵至龟兹，西域各君长纷纷拿出汉朝时代中央政府所颁赐的节传，可见他们对汉节十分重视，守而勿失，在他们的意识中一直保持着作为汉朝臣属的观念。

西域各君长部下的官吏，有当地民族中的贵族人士，也有中央政府所委派的汉人。例如，《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拘弥王成国的主簿秦牧、拜城县刻石《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颂》文中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等，很可能都是汉人（均在东汉桓帝时）。

西域各地自君长以下各级官吏，都受汉朝中央政府及西域都护的管辖和监督。西域各君长的代立，由中央政府选定或批准。当西域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或发生内乱时，西

域都护可以调发西域各地军队御敌或平乱。西域各君长遵照西域都护的命令发兵助粮，为巩固边防或削平叛乱作出贡献。中央政府和西域都护还从政治上积极维持西域各地的内部安定，直接处理重大的问题。如宣帝时，乌孙贵族内部矛盾，汉中央政府因而分立元贵靡、乌就屠为大小昆弥，并派长罗侯常惠屯赤谷（今苏联境内伊塞克湖东南），为他们划分人民、地界。后来，大昆弥所部形势不振，段会宗任西域都护，为之“招还亡畔，安定之”。段会宗去任后，小昆弥所部内乱，汉中央政府又两次派段会宗前往“安辑乌孙”。这也充分反映了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各地行使着完全的行政权力。汉政府的这些政治设施，客观上符合于西域各族人民的利益。所以两任都护的段会宗在西域有很高的威信。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跋涉万里去处理乌孙的问题，最后在乌孙病故，西域各地“为发丧立祠”，是一位为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做出了贡献的人物。自汉宣帝至新莽时期，先后任西域都护的凡十八人，其姓名见于史册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十人。李崇于天凤三年（16年）至西域，后没于龟兹。在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发现一颗铜印，鼻钮，篆刻阴文，共五字，为“李崇之印信”，这是李崇的私印。

二

西域都护（东汉中期以后为西域长史）除了监督西域各地的行政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是统帅中央政府在西域的驻防部队。汉朝平时常驻西域的部队都开垦屯田，力求自给自足，以减少军需运输的困难。早自武帝时期起，即开始屯田于渠犂（在今库尔勒县境），最初只有田卒数百人，不久就中止了。其后，搜粟都尉桑弘羊积极主张恢复屯田，他建议：“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牧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汉书·西域传》）。这项建议对于



图二 “司禾府印”印范

开发边疆是非常有利的，惜当时未被采纳。但不久至昭帝时，即采用桑弘羊前议，任命扞弥王太子赖丹为校尉，率军屯田轮台（在今轮台县境）、渠犂一带。元凤四年（前77年），又听从鄯善王尉屠耆的意见，派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于鄯善境内的伊循城（今若羌县米兰附近），后更置伊循都尉以领其事。宣帝时，轮台、渠犂的屯田兵已有一千五百人，分属三校尉。其后不久，屯田区扩展到车师（今吐鲁番盆地）、楼兰（今罗布淖尔北岸）、赤谷

等地。自从设立西域都护以后，各地的屯田事务统由都护总领。元帝时，又增置戊己校尉，专领车师境内的屯田部队。东汉明帝时，开始在伊吾（今哈密附近）屯田，设置宜禾都尉。1959年在民丰县尼雅遗址（汉代称为精绝）曾发现一颗东汉时期的“司禾府印”印范（炭精制，篆文，图二），可以证明在这一带地方也曾设立过屯田机构。许多宜于农作的地区，在两汉时期由于实行屯田而得到了开发。这不但有助于解决驻防部队的需要给养问题，而且对于西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今轮台、沙雅、若羌等县境和罗布淖尔北岸，发现过一些两汉屯田的遗址。如轮台东南克孜尔河畔柯克确尔汉代故城附近的红泥滩上，仍可见到沟渠田界的痕迹。又如沙雅县东哈拉哈塘附近有一道汉代的古渠，为红土所筑，现在仍可见到长达100多公里的渠道，宽约8米，深约3米，两旁有一些汉代城堡和农田遗址，出土过五铢钱。以上两处当系汉代在轮台、渠犂一带屯田所留下的遗迹。在若羌县米兰发现过一个汉代灌溉系统，沿着古代米兰河道，修建了总闸、分水闸、干渠和支渠，有的支渠长达2公里，此处也发现过汉代的文物和墓葬，据推测，应当是汉代在伊循城屯田的遗址。

在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曾发现汉文木简七十余枚，其有年代记录者上起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下迄成帝元延五年（前8年），简文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对研究汉代在西域的屯田制度很有价值（图版一）。简文中凡四见“居庐訾仓”（简13、15、16、17）。按《汉书·西域传》叙乌孙内乱，“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孟康注“卑鞬侯井”云：“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白龙堆就在今罗布淖尔东北，卑鞬侯井既在此处，则辛武贤遣使穿卑鞬侯井以西，正好到达罗布淖尔北岸，居庐仓即居庐訾仓无疑。《汉书》未明言这里有没有屯田区，但北岸遗址附近有古渠、柳堤等遗迹，这里有屯田区是没有疑问的，只是史书失载罢了。

土垠遗址地当交通要冲。当时交通线上的北道经过白龙堆，白龙堆一片盐碱，十分难行。土垠遗址位于白龙堆西端，无论东来西往，均以此为一大站。我们从该地出土汉简也可看出，这里的屯田区同其他许多地区都有联系。例如，简3提到“乌孙”；简10、11分别提到“伊循都尉”和“伊循卒史”；简12提到“龟兹王使者”；简15提到“车师”和“交河壁”；简16提到“交河”；简22提到“敦煌”和“渠犂(犁)”。由此可以推知，该地与乌垒、乌孙、伊循、龟兹、车师（交河）、渠犂、敦煌各地都有联系。

从这些汉简中可以了解当时西域屯田部队的一些组织情况。《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西域都护，加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所记简略，或者只是都护的掾属。据《续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我们结合此地出土汉简，可以知道西域都护所领屯田部

队也是按部、曲组织的。简8云：“君使宣告左右部司马衍□□”，简7云：“□部军守司马”。可见都护的部队分为左、右二部。又据简2、3、4、5、6等得知，其曲的组织有“左部左曲候”、“□部右曲候”、“左部后曲候”、“右部后曲候”等，按文，有左必有右，有后必有前，由此推论，每部之下都应当有左、右、前、后四曲，每曲有军候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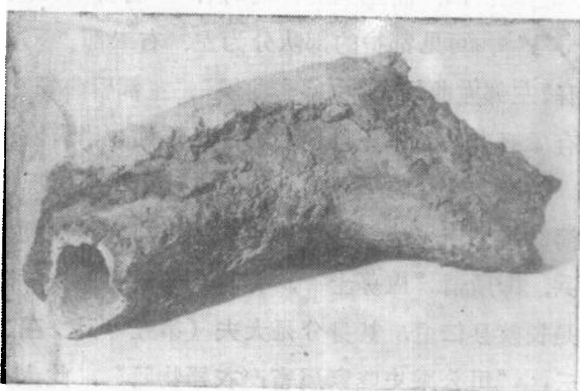
简文又反映了屯田士卒的来源和生活状况。有一些简文记载了屯田士卒的籍贯，如简30：“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按汉朝的屯田者除部队士兵外，还往往征募志愿兵，即所谓“应募士”，有时也调发弛刑徒，即流犯。本简中的孙尚是应募士，其籍贯是长陵县仁里，其身分是大夫（第五等爵，在二十爵等中是地位较低的）。又，简27云：“里公乘史隆家属畜产衣物籍”，此人史隆的籍贯县名里名应写在前一简上（已佚），本简从“里”字接写，公乘（第八等爵）为其身分，根据本简可以知道当时屯田士是携带家属、具备私有畜产衣物的。简34云：“士南阳郡涅阳石里宋钧亲^{妻乳年卅}_{私从者同}县^兼同里交上□□□”，本简上端残缺，“士”字上当有脱文。此人宋钧亲不仅携带家眷，而且还带来了“私从者”。其余如简35、36等残文中亦见“妻”字，可见当时屯田士卒携带家属是普遍的现象。《汉书·西域传》载王莽时，戊己校尉刁护的部下陈良等发动叛乱，“杀校尉刁护及子男四人、诸昆弟子男，独遗妇女小儿”，又“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跟随刁护驻在车师境内的不仅有他本人的妻室儿女，而且还有他的“诸昆弟子男”，可见他的家族都迁来了西域。同时，其部下吏士男女达二千余人之多，也可想见包括不少家眷在内。上面这些例证，足以说明伴随着汉代统一西域地区而实行的屯田制度，内地许多汉族居民携家带口迁到了西域，同当地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汉书·西域传》云：“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在这里居住的民族原就掌握了农业技术。汉朝统一西域以后，施行屯田政策，扩大垦种面积，修建渠道，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当地的人民、驻军以及来往的商旅在供应方面进一步得到保证，这就具体地说明了统一对于边疆地区的重要意义。

三

两汉时期西域地区的统一推动了西域同内地的经济交流，促进了生产的共同发展。除了前述中央政府的屯田制度所反映的农业生产情况外，举凡冶炼、商业等，莫不如此。西域许多地区的居民早已掌握了冶铁技术。《汉书·西域传》载：婼羌“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鄯善“能作兵，与婼羌同”；自且末以西，“作兵略与汉同”；莎车“有铁山”；龟兹“能铸冶，有铅”。据《汉书·陈汤传》所述，当时西域生产的兵刃“颇得汉巧”。这说明汉朝统一西域后，西域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互

相帮助，冶铸水平有所提高。

新疆发现了不少汉代的矿冶遗址。就冶铁言，重要的例子有库车县阿艾山遗址、民丰县尼雅遗址和洛浦县阿其克山遗址。在阿艾山遗址内出土小坩锅、铁渣、矿石和陶矽（鼓风管道）等，其陶矽与传世的“霸陵过氏矽”形制相同（图三）。在尼雅遗址出土矿石、烧结铁、矿渣、石凿、石球、砺石、残铁铲等，遗址的房屋内也有铁铸和木柄铁



图三 陶矽



图四 尼雅遗址



图五 铁铸

镰（图四、五、六）等。在阿其克山遗址内出土烧结铁和陶鼓风嘴，还在一个封闭的小洞中发现一堆石镰和石锤，其表面布满赤铁矿粉末。此外，在库车县东北可可沙还发现汉代铁矿遗址一处。关于炼铜，在距上述可可沙遗址 10 多公里的提克买克，发现有汉代遗址一处，范围约 2 平方公里。遗址内遍地都是铜矿石和炼渣，还见到鼓风嘴、炼炉底、碎矿用的石碾、马槽等物以及许多瓦片。在此附近的卡克马克还发现一处较小的铜矿遗址。

在上面这些矿冶遗址中，到处有汉代五铢钱共同出土，可以说明这些矿冶场所都是汉朝统一西域以后所兴办的。

除了矿冶业以外，我们从新疆各地汉代墓葬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当地兄弟民族在毛织、制革和珠宝等工艺方面都有相当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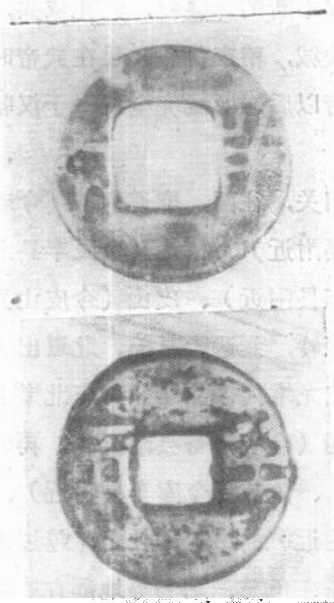


图六 木柄铁镢

的水平。最突出的例子有民丰县东汉合葬墓中所见到的毛织品残片,色彩鲜艳,图案有人兽葡萄纹、龟甲四瓣纹等,非常美观(图版二,2)。还有昭苏县乌孙墓中所见到的一件嵌宝石金戒指,制作精巧,光彩夺目。

两汉时代,西域同内地的商业往来频繁,物资交流十分通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张骞第二次到西域时,曾携带价值巨万的币帛,此后,汉朝中央政府常将大量绮绣杂缯等赠送给西域各地的贵族。西域的商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内地购买各种货物,其中尤以丝织品为大宗。此外,中亚各地的商人也大批通过西域来到中国内地经商。在新疆发现过大量汉代的丝织品。如昭苏县西汉时期的乌孙墓、民丰县东汉时期的合葬墓以及罗布淖尔汉代遗址都有不少的例证。其中尤以民丰合葬墓的出土物保存得最完善。墓主人身上的衣衾服饰几乎无一不是丝织品,织花和刺绣都很精致,有一件锦袍上织有“万世如意”字样,一件鸡鸣枕上织有“延年益寿宜子孙”字样(图版二,1;图版三,2),其衣裳形制则具有特殊的民族风格,看来是用内地输来的丝织衣料在当地裁制的。

新疆各处汉代遗址中还见到不少和内地形制相似的漆器、藤奩和木制用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罗布淖尔西汉遗址中也曾发现过麻纸,在民丰县东汉墓中也发现过纸张。



图七 半两钱



图八 汉法二体钱

西域的许多特产也在这时大量输入内地。最著名的工业品当为玉石和毛织物（氍毹、氍毹、氍等）。西域的农产品如葡萄、苜蓿、胡麻、胡椒、胡桃、葱、石榴等也都在汉代先后传入内地，使内地的蔬菜、水果品种大为增多。在传说中，将这些产品与张骞联系在一起。当然它们未必都是张骞带到内地来的，这种传说，只是反映了西域之统一，对于发展西域同内地之间的经济交往具有何等重要的关系。

商业的繁荣，必然促进汉朝中央政府统一的货币大量流行于西域各地。今天在新疆到处都发现汉代的五铢钱，足可证明这一点。在奇台县石城子西汉古城中，曾发现属于西汉早期的半两钱，这是迄今在新疆见到的年代最早的汉币（图七）。此外，在和田地区，曾发现过许多“汉佉二体钱”（亦称“和田马钱”）。这是一种无孔、无周廓的圆形铜币，有大小两种。其正面用篆体汉文标明币重，大钱作“重廿四铢铜钱”，小钱作“六铢钱”。反面中心作马形或骆驼形图案，周围环以佉卢文，为于阗王的姓名、称号（图八）。其时代应属东汉后期。币面使用佉卢文是受到贵霜帝国文化的影响，兼用汉文，则表明当时于阗人民和汉族人民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它用汉文标明币重，并使用汉朝统一的度量衡单位，说明当时于阗是遵循汉朝制度的。

四

汉朝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和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为了维持安定的秩序和保障交通安全，在西域重要的商道上修筑了许多城垒和连绵不断的烽燧台，驻扎戍兵，除了军事任务以外，兼管交通运输。在重要的地点还设置关城，稽查行旅。早在武帝时期，烽燧亭障已从敦煌延长到盐泽（即今罗布淖尔）。宣帝以后，西域完全统一于汉朝中央政权之下，烽燧组织和城垒关卡便遍及西域各地了。

西汉时期，西域主要的交通线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往西，取道鄯善（今若羌县附近），沿车尔臣河的古代河岸，经过且末（今且末县附近）、精绝（今民丰县北尼雅河末端）、扞弥（今于田县北沙漠中）、于阗（今和田县附近）、皮山（今皮山县附近），至莎车（今莎车县附近），再由莎车往西，越过葱岭，到达大月氏。北道出敦煌，往西，绕过三陇沙（今疏勒河西端沙漠）之北，横越白龙堆（今罗布淖尔东北岸之盐碱地），经楼兰（今罗布淖尔北岸），折向北至车师前国（今吐鲁番县附近），再转向西南，沿塔里木河古代河谷，取道焉耆（今焉耆县附近）、龟兹（今库车县附近）、姑墨（今阿克苏县附近），再往西南，至疏勒（今疏勒县附近）。由疏勒往西，越过葱岭，到达大宛。至于赴乌孙，则由北道上的车师前国、焉耆、龟兹、姑墨等地都有道路可通（越过天山的各个山口）。西汉末年，又开辟一条新道，即出敦煌以后，不经过三

陇沙和白龙堆，直接向北，取道伊吾（今哈密附近），越过博格达山，经过车师后国（今吉木萨尔县附近），然后沿天山北麓往西直达乌孙，这条道路为新北道。新北道也可从伊吾往西到达车师前国而与旧北道合。开辟这条新线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三陇沙和白龙堆的艰险。

汉朝的城垒烽燧就分布在上述这几条交通线上，其遗址保存至今者尤以旧北道一线为多，例如，在罗布淖尔北岸以及在焉耆至拜城之间，发现许多大小不等的汉代城垒及烽燧遗址，有些地方还能见到古代道路的痕迹。库车县西克孜尔尕哈的汉代烽燧台是保存很好的一处遗址（图版三，1），这座烽燧台岿然高耸，四望极目，至今可以想象到当时戍卒在这里昼夜守候的雄姿。



图九 云纹瓦当

考古工作者在奇台县石城子发现了一座西汉时期的古城遗址，其城垣系用夯土筑成，城中出土绳纹板瓦、筒瓦和云纹瓦当（图九）以及西汉早年的半两钱等物，可以证明这里曾设有汉朝的官署。根据文献考察，这里在西汉时期属车师后国之境。按《汉书·西域传》，当时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不居城郭。但车师境内别有所谓“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俱不载国王，显然这两个“国”并非相当于王国的行政单位，而只是指城郭而言。车师前国有都尉

一人，则“车师都尉国”应为此都尉所居之城，其地当在车师前国境内，与今奇台地址不符。“车师后城长国”之所以标明“后”字，当指该城在车师后国而言，后城长就是驻守该城的长官。据《汉书·西域传》，王莽时，车师后国的贵族狐兰支叛降匈奴，匈奴“遣兵与共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支)兵复还入匈奴。”这时，戊己校尉刁护派兵防守桓且谷，匈奴和狐兰支的军队并未侵入车师前国，由此可证“车师后城长国”确在车师后国境内。同时也说明车师后城长应是汉中央政府所派的长官。因此，奇台县石城子的西汉古城很可能就是“车师后城长国”的遗址，其出土的云纹瓦当等也很可能就是后城长所居官署的遗物。

有关汉代在西域修筑城垒的一项重要的文物，便是久已著闻于世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颂》刻石，这篇文字刻在拜城县东北喀拉达格山麓的岩壁上，由于长年风雨剥蚀，文字日渐模糊。过去已有不少人对这篇诵文作过考释，但因所据拓片都不清楚，所以颇有异说。今参照多种拓本重加考释，备录其文于下（图版四）：